

文化礼堂建设的经验、问题与对策

——基于浙江省四市九县的调查

萧放 贺少雅 鞠熙*

【摘要】对浙江省部分县市的考察发现，文化礼堂建设基本实现了政府、村民、乡贤能人和社会力量的共建共治共享，文化礼堂已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载体。其建设经验主要表现在：坚持政府主导、坚持党建引领、尊重群众主体性和多样化需求、重视乡村能人和返乡乡贤的参与、发挥优秀传统文化的治理作用、注重运营管理的模式创新。建议增强政策弹性，完善文化礼堂建设评价标准和目标定位；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激发乡村振兴内在动力；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和创造性；深入挖掘本土传统，提升文化向心力；创新管理模式，提升文化礼堂的化人育人作用。

【关键词】文化礼堂 传统文化 文化空间 社会治理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急剧转型，乡村空心化、老龄化日趋明显，基层组织涣散，公共产品缺乏，乡村弥漫着挥不去的“乡愁”。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如何推动乡村文化振兴成为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近年来，浙江省积极探索和推进农村文化礼堂惠民工程，致力于将其打造融礼堂、讲堂、文体活动空间于一体的村级文化阵地^①，目前已朝向“建、管、用、育”相结合的提质、扩面、增

效的新阶段迈进。2019年初，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支持建设文化礼堂、文化广场等设施”，将这一创新性实践提升到国家层面。同年4-8月，北京师范大学“百村社会治理调查”调研组实地踏访了舟山市定海区、湖州市安吉县、宁波市鄞州区、温州市瓯海区下辖9个县（区）24个村庄（社区）的30多座文化礼堂，获知农村文化礼堂建设已经基本实现了政府主导、村民踊跃参加、乡贤能人和社会力量协同的共建共治共享格局，文化礼堂已成为

* 萧放，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社会学院教授；贺少雅，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社会学院讲师；鞠熙，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社会学院副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新中国70年社会治理研究”（批准号：18@ZH011）子课题“百村社会治理调查”阶段性成果。

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文化空间。

一、文化礼堂建设的主要经验

（一）坚持政府主导文化礼堂建设

文化礼堂建设是一项多部门协调的综合工程，由各级宣传部门牵头协调，文明办、文化、广电新闻出版部门组织实施，农办、国土资源、财政等部门联动，并被纳入政府实事工程，作为各级领导班子尤其是乡镇领导干部的考核内容。文化礼堂推进程度体现着政府的决策能力、基层的执行能力以及当地经济社会综合实力。

以湖州市安吉县和温州市龙湾区为例，安吉县以“为民、便民、利民”为标准，将文化礼堂建设在居民较为聚集、环境相对优美的区块，定位为“乡村经济的增长点、新时代文明实践展示点、村民幸福感获得感展示点”。文化礼堂建设结合“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美丽乡村建设”“两山理念”等，着力打造既有村落自身特色又能充分凝聚人心的标志性文化产品，如村歌、文创产品等，增强村民归属感，并以活动为主线，一堂一韵，将文化礼堂建成没有围墙的博物馆。在县域范围内，以县委宣传部牵头，各部门发挥自身长处，利用文化礼堂综合体中的各个载体从不同角度丰富文化礼堂的精神内核，形成全域联动，在实际建设中注重提升领导干部的引导意识和服务意识，以文化礼堂为平台形成基层人员走上来，领导干部走下去的长效机制。温州市龙湾区南洋社区作为一个农村拆迁后建设的城市社区，将文化礼堂与社区中心合为一体，配套道德讲堂、科普馆、南洋乡村记忆馆、心理辅导室、百姓书屋、春泥乐园、心灵氧吧、舞蹈室等，可举办文娱活动、传统礼仪、系列课程、举办会议等，还与社区的卫生服务站、环保所、执法大队、禁毒大队等共享空间，承接健

康普查、保健宣传、生态保护、社区安全、青少年禁毒讲座等。两地文化礼堂的建设依靠强有力的经济基础、部门联合和上下联动，取得了很好的推进效果。

（二）坚持党建引领文化礼堂建设

坚强并富有成效的基层组织和领导是村集体经济壮大和党务政务工作顺利开展保障。调研发现，文化礼堂建设比较好的村落或社区都得益于一个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宁波市鄞州区回龙村文化礼堂的建设得益于现任党支部书记及其所带领的村两委。从2013年开始，回龙村两委坚持每周六晚召开圆桌会，宣讲国家形势和政策、通报梳理一周村内大小事务和矛盾纠纷。参加者以党小组为主，还有村民代表、本村志愿者和流动人口代表，有时也邀请法律、工程、环卫等专业人士参与。高效的工作机制为文化礼堂的建设奠定了组织基础。湖州安吉县高禹村在村党支部书记领导下，建立了一套卓有成效的事务处理机制。所有的事务通过五支队伍分散传达，又通过集中会议等形式进行梳理和总结。村里的各项事务得到了有效执行，比如村老年公寓商业化托养中心几乎将服务覆盖到了全村所有老人，这不仅是因为村民养老观念的改变，更是因为这个中心是全村督建，能够最大程度保障老人权益。文化礼堂的建设得益于此，将规范性的制度建设与灵活的运作方式相结合，以村民为主体，打造了一项系统工程。

（三）尊重群众的主体地位，满足人民多样化需求

农民是乡村社会治理的主体，也是乡村公共文化的服务对象。目前绝大多数文化礼堂均能够充分考虑群众需求，利用村庄既有文化资源，推动群体参与和管理，以集约型模式，满足群众多样化需求。

例如，宁波市鄞州区的传统村落走马塘村具有丰富历史底蕴，建筑保存较为完整，其文化礼堂便直接利用旧祠堂等建筑群改建而成；东光村文化礼堂由原有的老年文化活动和篮球场改扩建；回龙村文化礼堂改建自破败的徐姓祠堂。通过空间资源的有效利用，文化礼堂实现了功能节约化，承担着乡土文化传承、传统礼仪和青少年爱国教育等多重功能。舟山市南岙文化礼堂就包括了一系列文化服务设施，除礼堂建筑外，还覆盖邻近的道德讲堂、德治公园、法治公园、农家书屋、图书室、卫生室等，通过空间集聚，村民可以便捷地享受到普法、医疗、教育、文化艺术等公共服务。安吉县灵峰村作为灵峰街道中心村，将文化礼堂与街道综合文化站共建，与街道共享建设资源。文化站外设有文化广场，建筑内一层设有会议室、练歌房、书画室、儿童阅览室、科普区等。二层设有55张圆桌和配套厨房，专供村内红白喜事所用。同时，文化礼堂也成为村务、党务工作站。安吉县高禹村将文化礼堂与党群活动中心共建，“乡村振兴”规划展示馆和安吉移民文化博物馆作为安吉县“博物馆群”的组成部分，成为该村文化礼堂建设的重点和亮点。

（四）重视发挥乡村能人和返乡乡贤作用，推动多元共建

乡村知识分子和返乡乡贤大多具备专业知识和技能，熟悉本地风土人情，对家乡具有较深的情感，他们当中很多人已从资金投入、运营管理、活动组织等方面参与到文化礼堂建设和管理中。

温州市瓯海区梓上村注重发挥华侨资源优势，成立了乡贤共建理事会，服务于梓上村的村落建设，包括分享国外先进治理理念，提供国外优秀产品资源，鼓励借助华侨优势开展创业活动，提供乡村建设设想等。华侨为文化礼堂的建设提供了大量资金支持。瑞安市曹村镇

文化礼堂都有乡贤参与，乡贤理事会负责出点子、出钱出力。许岙文化礼堂建设过程中，乡贤捐款一百多万，东岙文化礼堂则有乡贤捐款两百多万。舟山市文化礼堂也有乡贤的积极参与。新建社区实施“文化礼堂管理三机制”，即明确一名社区分管干部，配备一名专职管理员，招募一名文化礼堂志愿者，建立起以管理员为主，文化志愿者为辅的管理团队，志愿者很多就由本地能人和乡贤担任。南岙社区组织成立乡贤理事会，参与到文化礼堂活动中。乡贤理事会会长在每年8月举办的学童启蒙仪式上，为孩子们开笔破蒙、朱砂启智。乡贤理事会秘书长作为社区女子舟山锣鼓队队长，带领锣鼓队登台演出，为村里赢得荣誉。

（五）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推动文化创新和转化

调研发现，文化礼堂建设比较好的村落或社区存在一个共性，即尊重传统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传承，促进社会主义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有机融合。安吉县山河村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该村至今传承着青狮舞队、腰鼓队等多样化传统组织，在传承传统民俗技艺的同时，“青狮会”的神圣和威严也被传承下来，发挥着对参与表演和观看表演者的规训功能。村内有威望的人组成了红白理事会，操持妥当，借由红白事达到村民的互相监督，强化村民凝聚力。村领导平时会参与青狮舞队、腰鼓队，每逢村民办喜事等活动，会亲自参与上门道贺，重大节日全村参与，取得了凝聚人心的效果。村里的志愿者服务队带有组织性，但不具有强制性，志愿者们统一着装，既带有传统乡村共同体的机制，也带有现代性，集体感与凝聚力较强。山河村重视家庭关系，村中年轻人在外打工，回村养老，村里负责保障养老和孩子的教育，传统没有完全断裂，还是以家庭为单位、以大家庭为基础的高度的熟人社

会。在这样的氛围下，山河村的文化礼堂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前提下，保留了祠堂祭祀香火，满足了村民祭祖需要，也可供孩子读书、供老年人休闲娱乐。

（六）创新运营管理方式，实现文化礼堂可持续发展

文化礼堂的运营管理考验着基层的创新活力。宁波市回龙村作出了有力的探索。当地本着实用为先的原则，采取分波段的方式，将文化礼堂从最初不足400平方米的旧祠堂，逐步建成了融举办讲座、节庆礼仪活动及日常休闲健身功能于一体的综合功能体，且仍在不断更新。这样既可以降低资金风险，也可以随着时代发展更好地满足群众的多样化需求。同时在坚持公益性的前提下，采取第三方社会化运作模式，走公共文化市场化运作之路，实行“管办分离”“以馆养堂”，实现了礼堂管理人员和服务的专业化，减轻了运营的费用负担，将文化礼堂的“用”落到了实处。合作的健身连锁公司已经引入舞蹈、瑜伽和拉丁舞等专业教练，开办了瑜伽课程、游泳和日常健身，投入上百万元更新设备设施，配有专门的行政管理人员，负责日常管理和保洁水电等，每年还上交16万元给村里。温州市瑞安市探索出四种模式和制度：一是实现俱乐部管理模式。俱乐部一般下设资金筹集部、接待部、交流部、文艺演出部等六个部分，且必须在民政局登记。二是内容上实行“五连亲”制度，温州市、乡镇、民间团队、企业、村居进行结对帮扶，暑假还有新青年下乡活动，有助于丰富文化礼堂活动。三是开展内容丰富多彩的周末学堂，针对不同年龄群体开设健康讲座、插花艺术和木活字体验等讲座和课程，还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重要平台。四是成为宣扬传统美德的阵地，各村在文化礼堂内举行好媳妇、好婆婆、优秀学子等评选活动。截至2018年，瑞

安评选民间道德设奖672项，有2万多人受益。

二、文化礼堂成为农村社会治理的重要载体

文化礼堂经过几年的建设基本满足了农民群众举办文化节庆、社会仪式、文体活动以及举行议事集会等功能需求。不少社区组建起道德模范、身边好人、乡土道德宣讲员等“道德走亲”队伍，利用文化礼堂向群众宣讲时事政策、弘扬正能量。通过组织青少年开展红色经典诵读和劳动实践育人基地等，将文化礼堂打造成教育的重要平台。

文化礼堂成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载体和村民的精神园地。文化礼堂有历史名人与当代道德模范的事迹展陈，有引导健康文明向上的寿星榜、学子榜、家风家训榜，有农业文化遗产与村落生活文化的鲜活呈现，还有的引入国学书院讲学、共读传统经典等，极大丰富了村民的精神生活。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的融入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参与，使得传统在现代得以传承和创新。

文化礼堂成为传承弘扬优秀伦理道德和移风易俗的文化空间。村两委利用文化礼堂为村民提供酒席餐饮公益服务的时机，大力提倡婚事新办，丧事俭办，寿庆简办，宣传“文明餐桌”和“酒席减负”，宣传火葬和文明祭扫等。充满正能量的文化礼堂对群众产生了更大的吸引力，村民舍宫庙入礼堂，一些信仰活动为健康文明的精神文化活动所替代。逢春节、重阳等重大节日开展的以道德伦理、孝善文化为主题的系列民俗活动，形成了孝德文明新风。

文化礼堂成为具有一定组织能力和凝聚力的公共空间以及社会交往的重要节点。文化礼堂对村史名人和乡风民俗的展览展示起到了留住乡村记忆、唤醒乡愁、提升村落认同的重要作用。各种节庆仪式活动以及放电影、送戏下

乡等促进了人群互动。基于一定主题开展的讲座培训和文体活动促进了趣缘群体的形成，改善了村民关系。村两委通过参与文化礼堂各项活动，密切了干群关系，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重要途径。

三、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

（一）政策空间和弹性不足

文化礼堂的建设和管理由于牵扯部门过多和各部门行政条割，一些问题很难协同，且政策执行过程中常常“一刀切”。以宁波市鄞州区为例，当地村庄发展背景、发展环境、发展方式各有不同，城中村、合并村、严重空心村各自面临着不同的问题。但按照现行政策要求，文化礼堂必须在三年之内全覆盖，在一定程度上人为拉大了村庄之间的差距。比如由六个自然村合并而成的涵玉村，按照当地人话说属于“弱弱联合”村，在文化礼堂的选址上就出现了困难。文化礼堂原定建在涵玉村的中心，但是村中心为社区服务中心，无可改建的建筑和新建的用地，加上受制于国家土地规划和使用相关规定，也无可使用的建筑用地指标，导致礼堂建设至今无果。另外建设和运行资金短缺也制约着文化礼堂的建设。在鄞州区，现在建一个普通的文化礼堂通常要五六百万元以上，最高逾千万。然而，上级拨款却分次下拨，补贴总数也仅有八十万元，余下的只能由村集体贴补。礼堂建成后还需要后续的资金投入，如相关管理人员的薪酬、补助，既有设施设备的维护及展陈展览内容的更新，开展各类活动所需经费，新增文化礼堂的建设及老旧文化礼堂的提升等，这很可能对村集体经济产生影响。

（二）缺乏强有力的组织管理队伍

文化礼堂建设与村集体经济实力和带头人

的意识直接相关，魅力型权威在相关制度不完善时能够起到较大作用。调研中普遍反映的土地使用、资金匮乏等问题，说到底均与村两委的工作能力挂钩。宁波市回龙村文化礼堂的建设及使用取得较好效果，并得到上级部门极高评价和宣传，就与村党支部书记的个人魄力、较高的个人素质及良好的团队领导力密切相关。反观部分建设一般的村落，要么村委委员对本村情况都不甚明了，要么村两委协作力不强，要么对文化礼堂作用缺乏正确认识。以至于很多文化礼堂硬件设施一流，却没有充分利用，有的只有举行活动时才开门，平时经常处于关门状态。有的甚至认为文化礼堂是社区财产，只能作为高配置的大会堂用来开会、组织活动，平时不能随意使用，这极大影响了文化礼堂的功能与价值发挥。同时，文化管理专业人才的缺乏是文化礼堂可持续发展的大问题。目前，文化礼堂的管理一般都是村委兼职，村妇女主任兼职活动组织，但是他们平时多因业务繁忙，很难全身心投入文化礼堂管理工作，再加上组织者多基于妇女党团的工作经验来开展活动，内容相对贫乏。虽然上级部门安排了大量的送戏下乡、放电影等资源，但下沉到辖区各村落和社区以后，每个村分配到的资源有限。所以，如果文化礼堂内展示展陈更新慢、礼仪活动组织效果不好、文艺节目新意不够，那么村民的参与度就会下降。更有部分发展旅游的村落，直接将村民变为文化活动的表演者，而非自主自发的组织者，长此以往，会让村民丧失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也不利于文化传承。

（三）文化内涵挖掘不够

调研发现，文化礼堂无论从建设和使用，对于文化的挖掘和创造性使用还远远不够。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绝大多数文化礼堂建筑风格大同小异。且在建设过程中基本由村两委主导，展览展示部分流于简单化，有的委托给

外面的公司来做,甚至展品都是从外村收集的。这与利用文化礼堂唤醒历史记忆和凝聚人心的主观目的还相去甚远^②。二是文化活动还存在普及性不强、本土特色不明显等问题。活动组织者总体上还缺乏文化自觉,活动的目的还停留在“拍照取证”和“应付报表”层面上。加上人力物力有限,许多活动层面不断缩小,活动范围不断减少,活动的对象只限于中老年人群或女性,活动的范围只限于室内。比如T村开展的“我们的节日·立夏”主题活动,组织者可谓尽心尽力,开展了“立夏称重”“立夏蛋斗蛋”“趣味游戏——毽步如飞”“关爱女性妇科保健知识宣传”等非常丰富的活动,但是对文化本身的内涵挖掘还不够,有的参加者奔着热闹或者赠送的礼品去的,现场哄抢礼品、多拿礼品的场景也令活动效果大打折扣。

(四) 文化向心力有待提升

文化礼堂是一种“行政嵌入型”^③或称“外源性嵌入式现代公共空间”^④,无论是政策宣讲、公益讲座还是礼仪活动,都无不体现着较强烈的国家意志。再加上礼堂和很多党务、政务工作的结合,使得其本身在硬件和内容建设上都与乡土文化传统有所区别。那么,如何创造性地引入现代文化观念对传统文化载体进行适度开发值得思考。以祠堂而论,祠堂是祖先信仰的物质载体,被改建为文化礼堂,体现出政府要在不同于宗族约束逻辑的另一套现代化治理逻辑中,试图延续扮演祠堂曾经的角色。有的学者对此从国家的文化在创造予以肯定^⑤,有的则认为这是国家介入地方的一种政治建构,祠堂的原生拥有者主体“失语”和被排斥,且伴随着“乡村旅游”和“遗产旅游”的商业性开发,以祠堂为代表的文化遗产被过度开发,文化记忆被蚕食^⑥。有的村虽然有制度的支持和能人的领导,旅游产业依托文化礼堂实行产业化运行,初步达到以“以堂养堂”

基本目标,但由于缺乏文化深入挖掘和打造,文化礼堂“礼仪活动”还停留在表象上的文化活动与文化表演,缺乏真正的精神内核,旅游收益增长不大。同时,在很多村落文化礼堂尚未成为共享的文化空间。村民若举办婚礼、寿诞等人生礼仪活动需要提前向文化礼堂管理者预约,且本村人具有优先使用权,外村人所支付的场地使用费也比本村人多。

四、提升文化礼堂建设的对策

当前,政府的公共文化服务虽然在硬件建设方面取得巨大进步,但也存在公众参与不足、内容不足即“公共文化”建设欠缺等问题,就此,高丙中提出构建国家与社会二元主体,吸纳非遗资源,构建地方特色公共文化等建议^⑦。陈波、侯雪言也提出探索提升居民公共文化参与率的对策^⑧。基于文化礼堂建设的提升,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一) 增强政策弹性,完善文化礼堂建设的评价标准和目标定位

第一,文化礼堂建设应该因地制宜,是否需要建,怎样建,建成什么标准,需灵活处理。一些人口严重空心化、经济水平较低和政策处理复杂的合并村等要作出针对性的规划。即使是经济条件较好的村落,也可适当降低硬件要求,提升内容建设要求,以杜绝攀比浪费。第二,文化礼堂在全国的铺开也要有序施行。转型时期的中国,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以及乡村内部千差万别,要尊重当地经济发展、文化传统和群众需求,适当推进。第三,文化礼堂的内容选择对于民间传承的生活文化要留有比较宽容的政策空间,要在强调党和国家文化宣传教育的主导精神下,尽量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精神需求,让文化礼堂在成为社会主义新文化教育传播阵地的同时,也成为地方传

统文化与民众生活文化空间。这样，既能密切党群关系，也为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提供重要支撑与保障。第四，地方党政部门应将文化礼堂建设纳入基层文化建设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之中，予以财政支持，并定期评估考核。

（二）培育熟悉政情与民情的权威型领导者和具有实干精神的管理队伍，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关于文化礼堂的建设，现有论述多将其纳入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中加以讨论，但作为一项自上而下执行的文化行政工程，最终的落地和创造还是需要自下而上的实现，要靠乡村的内生动力。文化礼堂不仅事关精神文明建设，更是乡村发展和振兴的综合工程。所以有关部门要拓宽思路，提升对文化建设的认识，将文化礼堂建设置于“三农”工作与乡村振兴战略、建设社会治理现代化体系的大背景下实施，打破条块分割，形成资源整合，尤其是与组织部、民政等部门紧密配合，推动基层党建工作与乡村各项具体工作相结合，将文化礼堂项目执行作为培养村落带头人和领导的机会，作为考核基层组织活力的标准之一，助力培养熟悉政情与民情的权威型领导者和实干型队伍，筑牢乡村文化阵地，激发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村党支部与村民委员会应为文化礼堂日常管理的第一责任人，让文化礼堂成为基层社区党建宣讲堂、日常事务管理的议事厅、生活文化服务的礼仪堂与娱乐空间。

（三）采取多种措施调动群众参与积极性和创造性，提升人民幸福感和满意度

关于文化礼堂的改进建议的研究很多，都提到要充分依靠群众，发挥群众主体性^⑨。本文认为，只有真正从群众需要出发，才能从本质上提升其主体性和创造性。首先要根据村庄发展需要和群众需求综合考虑文化礼堂的选

址、建设规模、改进措施和建设方向等。突出礼堂的实用便捷，减少不必要的装潢设施和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同时摸清群众的多样化需求，有重点、有步骤、有针对性地引进资源，倾向知识培训的可适当丰富培训内容，喜欢文化娱乐活动的要提升演出品质，有较多阅读需求的可扩充图书种类并定期更换图书。主要面向年轻人的，可增加各种电子设备、时尚的培训内容、健身娱乐项目等；并要特别关注，回应女性在政策宣传、知识普及、技能培训、健康讲座、娱乐文化等方面的需求。其次要充分调动本土精英、返乡乡贤及社会力量参与。基层管理者要善于将文化礼堂建设与乡村建设各项工作勾连起来，采取政策鼓励、荣誉支持和物质奖励等方式，让本土精英、返乡乡贤、外来优秀分子等积极参与文化礼堂和乡村建设中。更要重视外来人口中的优秀分子，要从子女入学、困难帮扶等实际生活出发给予关怀，以增加他们的社区融入感，促进他们的社区认同和参与社区活动的热情。

（四）深入挖掘提炼本土文化传统，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有机融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⑩。文化礼堂的可持续发展要建基于深厚的乡土文化，实现社会主义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结合，成为提升农民文化自信的重要物质载体。建议：第一，尊重村民的历史文化、伦理道德和情感信仰，合理利用、深入挖掘和有效整合本土文化资源，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将文化礼堂作为村落历史文化传承和文化遗产教育的空间。要把文化礼堂打造成促进人群互动和社区融入的精神空间，促进文化资源共享，提升居民的社区认同。第二，采用政策宣讲、文艺演出、社会实践等多种形式，向村民尤其是

青年一代宣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优秀革命传统,传承优秀乡土文化,提升人们的乡土文化意识和对文化礼堂建设的认同。第三,尊重乡村社会治理传统,将其与基层党建、村民自治以及社会组织建设相结合,用本土智慧推动文化礼堂建设,使文化礼堂由政府宣传的平台变为能够满足村民需求、自由表达意愿、自愿参与管理的精神家园,成为组织人群、凝聚人心的公共文化空间,成为基层社会共同体的精神空间、情感空间与社会活动空间。

(五) 创新运营管理模式,充分发挥文化礼堂的社会治理作用

经过几年的大力推进,浙江省文化礼堂已经基本实现了“在500人以上的村全覆盖”,硬件建设齐备,2018年下半年以来,在全国如火如荼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大背景下,文化礼堂又在积极作出新的探索。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所强调的,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要着眼于凝聚群众、引导群众,以文化人、成风化俗,不断提升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和全社会文明程度。如何改进管理模式和增进实际效用,发挥文化礼堂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将其打造升级与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紧密结合,成为下一步的重点任务。建议可继续加大管理创新,采取“管办分离”模式,在坚持公益性前提下,社会环境许可的地方,引入第三方社会力量,走公共文化市场化之路,将文化治理作用落到实处。

乡村文化空间重建与创造性转化拓展,是中国大部分乡村面临的重要现实课题。文化礼堂是浙江省委推动的乡村文化振兴与文化空间建设工程,在党委、政府与社会的三方合力下,目前制度构架与实践推广中取得了明显的成绩。浙江的实践为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有益的探索模式。虽然,当代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

设尚未达到与乡村生活密合无间的理想程度,但路径与趋势已经明确,只要我们坚毅前行,乡村文化共同体的重建之路必定实现。

- ① 参见浙江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联合发布的《关于推进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的意见》(浙委办发〔2013〕37号),2013年5月10日。
- ② 参见雷家军《“四自”:从经验到目标——以浙江临安村级文化礼堂建设为重心的调查与思考》,《中华文化论坛》2015年第12期。
- ③ 曹海林《村落公共空间:透视乡村社会秩序生成与重构的一个分析视角》,《天府新论》2005年第4期。
- ④ 李志农、乔文红《传统村落公共文化空间与民族地区乡村治理——以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奔子栏村“拉斯节”为例》,《学术探索》2011年第8期。
- ⑤ 靳浩辉《农村社会治理视阈下祠堂文化与公共文化的互嵌与重构》,《理论月刊》2018年第7期。
- ⑥ 林敏霞、颜玲云《从宗祠到文化礼堂:村落传统建筑遗产功能研究》,《民族论坛》2016年第12期。
- ⑦ 高丙中《公共文化的概念及服务体系建设的双元主体问题》,《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 ⑧ 陈波、侯雪言《公共文化空间与文化参与:基于文化场景理论的实证研究》,《湖南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
- ⑨ 比如,尹怀斌提出,要正确评估礼堂建设的阶段性特征,相信群众,给予群众实践以更多耐心和信心;深入挖掘整理群众需求和评价信息,强化群众需求导向,建立群众精神文化需求表达汇集机制,探索建立农村群众评价公共文化服务机制,完善服务资源供给方式机制;提升礼堂文化的价值境界,不能靠外在输血“送文化”,要增强群众自主“种文化”能力;同时要加加强管理员队伍、志愿者队伍建设,资源整合优化和资金多元保障建设。参见尹怀斌《农村群众自主参与文化礼堂建设研究》,《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
- ⑩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责任编辑:杨婷)